

GUOXUE ER LI JI

国学而立集

许刚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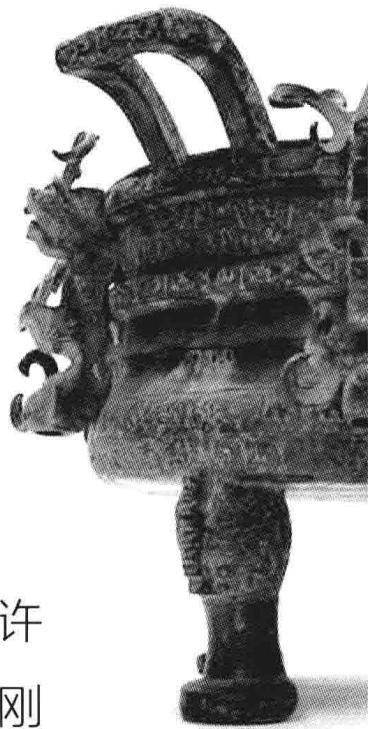
GUOXUE ERLI JI

国学而立集

许刚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而立集/许刚.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文库)

ISBN 978-7-5622-6442-2

I. ①国… II. ①许… III. ①国学—中国—文集 IV. ①Z21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845 号

## 国学而立集

---

作    者:许  刚◎

责任编辑:沈继成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甘  英

编  辑  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      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678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邮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40 千字

印张:15.5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定价:3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 总序

在华中师范大学建校 110 周年之际，历史文化学院推出教授文库和青年文库，作为献给 110 周年校庆的一份厚重的学术之礼！

从文华时期初设历史课程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并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百余年来，历史学人辛勤耕耘，代有建树，涌现出一群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培养了大量的史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如今历史学不仅发展成为华中师大的传统优势学科，而且获得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拥有良好的学术声誉。章开沅、熊铁基等老一代学者老当益壮，依然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辛勤育人，笔耕不辍；马敏、朱英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活跃在学术界前沿，培育新学科，扶植新人；一大批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锐意进取，引领着学科发展的未来。历史文化学院正显现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是，在高等教育日新月异的当下，竞争激烈，不进则退。而在文化日益成为产业的今天，学术著作的出版正面临冷峻的“冬天”。为了推动历史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解历史著作出版之难局，历史文化学院于 2011 年设立出版基金，陆续推出教授文库和青年文库。每年在教师中遴选若干著作，或个人专著，或个人文集，集中出版，既展现本院历史研究的成果，助推学科建设，又为历史学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系统的、能够反映本院教师研究特色的阅读材料。

展史学之佳作，传学术之薪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文库与青年文库的同时推出，必将推动历史学科向更高水平迈进。今日之愿，来日可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序

徐 梓

初“识”许刚，只知其名，未见其人。

自从198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之后，我时常惦念桂子山的师友，关注他们学术的发展，特别爱读他们纪念、研究先师张舜徽老师及其学术的论著。老师的弟子也是我的师兄弟，我都是熟识的，哪怕是我离校后才进门的学弟学妹，也能从师兄弟们的交流中略知一二。但从2006年后，我越来越多地在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中，注意到一个叫“许刚”的名字，研究张先生学术的论著不仅多，而且质量高。打电话回武汉询问，才知道是大师兄周国林教授的高足。我不禁感叹，学术的发展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每一代学者都从上一代人那里领受遗产，又从下一茬人那里接受挑战，真是前辈可敬、后生可畏呀。

2011年初，我因为准备回桂子山参加纪念导师诞生百年的学术讨论会，正在撰写《张舜徽先生学术的教育意蕴》一文，需要参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许刚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设法找到了一册寄给我，还寄来了他的大作《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由此我和许刚建立了联系。但直到这年的6月下旬，我到武汉参加纪念张舜徽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2届年会，才得以与他相见。

许刚的学术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而《国学而立集》也主要由这三部分组成。

一是孝文化研究。从2006年留校工作的次年开始，许刚就在华中师范



大学开设综合素质通选课《中国孝文化》。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理交融，雅俗共赏”的讲授风格，深受学生喜爱，每一轮讲授，都有近百人选修。有大学教学经验的教师都知道，当今大学生都颇为挑剔，对于选修课的选择更是几近苛刻。如果没有适切的教学内容、深厚的学术基础、极具魅力的教学艺术、益人情志的教学效果、一级又一级相传的教学口碑，一门课持续多年有近百人选修是绝对不可能的。凤凰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出版的《中国孝文化十讲》，就是他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他在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二是学术史研究。许刚的学术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以张舜徽先生为研究核心、博涉广营、沟通古今的体系。如果把许刚有关张舜徽先生的研究成果制成目录，那将是一份很长的篇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6 月出版的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张舜徽的汉代学术研究》，就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之作。显而易见，许刚认同张老师的学术理想，学宗气象博大，以求融会贯通。为了把对先生的学术研究引向深入，他不只是孤立地研究对象本身，而且也钻研张老师研究的对象，如《汉书艺文志》、刘知几和《史通》、章学诚和郑樵等，并将张先生与现代学人如钱穆等做比较研究，力求在更加弘阔的背景下来看待张先生及其学术。正因为与张先生相关的时空背景较大，所以这一研究所挖掘出的历史意义也就颇为丰富、较为深刻。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刚有关学术史研究的所有成果，都是以对张先生的研究为基础和起点的。正因为有宗主，有归宿，有统纪，所以许刚的学术史研究范围虽广，但博而不杂。

三是国学教育。许刚的学术工作，很多都可以归为国学教育的范畴，但我这里所指还不在于此，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参与编撰了《国学基础教程》《中国孩子最喜爱的国学读本》这样的一些读物，而是因为他近年来在这一领域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许刚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学培训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兼职研究员、九江学院陈寅恪研究院研究员、湖北明志国学教育研究推广中心客座高级讲师，这些年来，他经常走出桂子山，走进别的大学和更加广阔的社会讲堂，走上湖北电视台《书香荆楚》、山东卫视《新杏坛》栏目开讲中国传统国学，从事国学的普及和推广工作。他经常在湖北、山东各地为高校大学生、部队军人、企业总裁、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等演讲，活跃在国学教育的



第一线。我们的每一次通话，都离不开这个话题。

许刚的博士生导师周国林、博士后合作导师谢贵安都是我的师兄，许刚每每亲切地称呼我为师叔。他的《国学而立集》出版在即，索序于我。我为他不断有成果面世而高兴，也对他有更多、更高质量的成果奉献给学术界和全社会而充满期待，所以不揣谫陋，写下上面的文字，用以激励许刚，更用以自励。

2013年10月6日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

(徐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 目录



- 001 总序  
001 序  
001 关于舜帝孝道研究的一点感想  
008 《管子》中的孝道伦理  
015 《孝经》作者考论  
021 孝惠帝、孝文帝与汉初“以孝治天下”考论  
033 陈寅恪先生家世孝道考  
093 “中国特色”的孝文化  
098 “中国特色”的书院师道  
102 西汉《鲁论》三家说  
110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补正  
112 《史通笺记》补正  
115 中国古代的私家目录与时代政治  
125 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目录学成就新论  
137 文本的差异，时代的痕迹——张舜徽先生《广文字蒙求》两种版本前后变动刍议  
145 理想与现实——读张舜徽先生《中华民通史》  
158 论钱穆与张舜徽对刘知几的评价  
169 清代学术史中的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180 纪念国学大师 弘扬国学精神——献给钱基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186 张舜徽先生于传统经、史、子、集之认识



- 198 而立之年的不惑之论——读张舜徽先生《壮议轩日记》
- 207 二十世纪之初《书目答问》研究的最新力作——评《〈书目答问〉校补》
- 216 “简约易读，精见迭出”的《说文》学巨著——评《说文解字约注》
- 220 览一知四：四注合为一编的《近思录》——评张京华先生辑校《近思录集释》
- 224 改变我生命的新民师——致敬先生及中国文化书院
- 235 后记

# 关于舜帝孝道研究的一点感想

舜帝孝道向来为古之学者所推崇，并作为孝道教化素材，居《二十四孝》之首。近些年来，在对中国孝文化、伦理学等的研究中，有学者对舜帝孝道提出不同的看法，值得注意。到底如何看待舜帝孝道的有与无、真与假、好与坏，学术界恐怕一时还难以达成意见上的统一，这里也只是将心中的一点感想形成文字，以就正于学界同仁，尚冀不吝赐教。

## 一、几种意见

蔡元培先生《中国伦理学史》曰：“盖至舜而吾民族固有之伦理思想，已有基础矣。”<sup>①</sup>蔡先生对舜帝孝道伦理，是持肯定态度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多家伦理思想史著作均秉承此论<sup>②</sup>。钟泰先生则在章太炎先生《孝经本夏法说》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孟子言孝，首推大舜”，“使尧舜之事为不妄，孝治天下之说，固有先乎夏世者矣”<sup>③</sup>。汪受宽先生《孝经译注》认为“至迟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孝的概念”<sup>④</sup>，对舜帝孝道亦抱认同看法。张祥龙先生更自孝意识的时间分析角度入手，指出舜帝“能够顺利

<sup>①</sup>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页。

<sup>②</sup> 如陈瑛先生等所著《中国伦理思想史》即于舜帝道德予以一定笔墨，谓“舜已经认识到道德的重要作用，强调了道德教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陈先生最新主编之《中国伦理思想史》依然给予舜帝特别注意，参见其书第24、2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sup>③</sup> 钟泰：《中国哲学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sup>④</sup> 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地从儿时的孝情过渡到少年、青年时的孝意识，其间无大的断裂，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sup>①</sup>，其阐论方法、思路较之此前可谓新颖独特。康学伟先生认为“尧舜之时已有了以孝化民的事实”，“尧舜时代已将孝作为家庭之礼来推崇，用以教化百姓，使家庭和睦稳定”，“我们有理由认为，虞舜孝亲的传说是历史中确乎存在的”，“诚然，关于虞舜孝亲的众多传说，不一定全是事实，很可能含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为了现实需要而粉饰古人”，但“不难看出，其中究竟还是表现出了真实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不可能完全是编造的”<sup>②</sup>。侯希文先生亦认为，尧舜时代“包括‘孝’在内的‘五教’”，“可能夹杂了后世作者的思想，尚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尧、舜时代人们对‘孝’观念的认识有了初步发展”<sup>③</sup>。俞绵超先生对孟子笔下舜的形象进行了详细梳理<sup>④</sup>，刘守华先生则以敦煌变文中的舜子至孝故事为对象，探析其经历了神话——传说——故事的历史演变过程<sup>⑤</sup>。可见，正视并开展舜帝孝道研究的学者不绝如缕<sup>⑥</sup>。

① 张祥龙：《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② 康学伟：《论孝观念形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③ 侯希文：《试论“孝”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兼谈“孝”的现实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④ 俞绵超：《孟子笔下的舜的形象》，《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⑤ 刘守华：《试论敦煌变文舜子至孝故事的形态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⑥ 关于舜帝孝道研究，还可以参考以下学者的论述：翟满桂、蔡自新认为“舜帝躬践孝悌德行，首倡伦理道德，可谓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始祖”，“舜以崇尚孝悌而闻名于时，以全新的道德文化开辟了东方人类社会的新纪元”（《舜帝的孝悌与施政》，《求索》2000年第6期；《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邓国文、于秀艳认为“后世儒家提倡的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是对舜帝的继承和发展”（《论舜帝家庭伦理精神的当代价值》，《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尤慎指出，“舜把儿女对父母的单向的孝，发展为双向的复线关系，即儿女对父母要孝顺，父母对儿女也要义慈。双方都有义务和责任，关系才会更正常更融洽。按此原理，更推广到兄弟、朋友、夫妻关系，把每个人最亲近的关系编成了坚实的双线网络，这就是人伦五典。传统道德伦理体系按此复线原理构成，就更加严密、牢固、合理”（《尧舜德治之比较》，《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周甲辰从“和”的角度剖析，认为“舜的事迹告诉我们，个人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这些家庭关系规范，完全是无条件的。双方中任何一方严重违反这些规范，都不能作为另一方不遵守这些规范的理由。受侵害的一方，必须忍让，也只有忍让。因为一旦引起争端，就失去了‘和’。舜就是忍让的典范”（《论舜帝之和》，《零陵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与蔡元培先生不同，顾颉刚先生对舜帝孝道的真实性是有疑问的，郑慧生先生对此深表赞成，认为“大舜至孝的故事，显然是后人所附会”<sup>①</sup>。肖群忠先生亦持郑说<sup>②</sup>。沈善洪、王凤贤所著《中国伦理思想史》认为商人尚无孝的观念<sup>③</sup>，其书自然对于舜帝孝道也就未加论述了。朱贻庭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相对审慎一些，认为“周人‘孝’的观念和对这一观念的提倡，明显地超过了它的前代殷、夏”，“‘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到西周才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sup>④</sup>，不过仍对舜帝孝道未予涉及。查昌国先生既以孝起源于周初，故其先秦孝道研究亦径自西周论起，此前若舜帝孝道等则置而毋论<sup>⑤</sup>。显然，否定或者避谈舜帝孝道的学者亦不乏其人。

## 二、一点感想

舜帝孝道涉及中国孝文化的起源问题，从中国孝文化历史的通体演变、整体考察来说，对此似不能不予以适当关注。笔者认为，舜帝孝道应是具有相当可信性的，如果我们不拘泥死板地将其过度理想化，其中所折射出的先秦孝文化（包括儒家孝道伦理学说的建立）因子，还是颇具启示意义的。

否定或者避谈舜帝孝道的学者，多从文字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卜辞、金文，认为其中的孝字并非如后世《尔雅》《说文》所云“善事父母”为孝，而是与祭祀有关，查昌国先生对此所作考释最为详尽<sup>⑥</sup>。不过，这似乎并不能作为先秦西周以前无孝的论断依据。换句话说，即便能够证明这

<sup>①</sup> 郑慧生：《商代“孝”道质疑》，《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

<sup>②</sup> 参见郑慧生：《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sup>③</sup> 参见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sup>④</sup>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sup>⑤</sup> 参见查昌国：《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sup>⑥</sup> 参见查昌国：《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中《西周“孝”义试探》、《论春秋之“孝”非尊亲》诸文，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些孝字并非后世意义上的孝亲，却不可以就断定彼时及彼时之前全无孝道伦理、孝亲意识。查昌国先生认为：“关于西周孝不以生人为对象的论断，还可得到《诗》中有关材料的印证。《诗》中‘孝’见于十二篇十八次，其中‘孝子’、‘孝孙’七次，孝对象都未确指。度其上下文，有对象的全是指向王先妣。”<sup>①</sup> 虽然，我们仍不禁要问的是，《诗经》中更有《鶡羽》《陟岵》《蓼莪》等表达子女对父母孝思之情的篇章，甚或被誉为千古孝思绝作，这无疑是孝道伦理发生存在的活生生例证。如何解释呢？查先生强调道：“《诗》中出现了人伦意义的父子概念，也有父子之爱的记载，但这仅表明了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视为礼制上的规定与认可。而事实存在与礼制认可，是不同的两回事。另外，爱父母与孝父母也不是一回事，爱表示自然情感，孝则是伦理规范。”<sup>②</sup> 说似在理，然终嫌缭绕。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陈爱平《孝说》指出：“既然在先秦古籍中的‘孝’字表示祭祀，那先秦时期的孝道到底用哪个词语表达呢？先秦在表示孝养父母时，另有专词，那就是‘畜’、‘养’。”<sup>③</sup> 原来，在西周以前，普通意义上的孝道、孝亲，是用“畜”、“养”来表示的，孝字则是表示继承、祭祀的宗教伦理，此后，“孝”字涵义与范畴不断扩大，一般意义上的孝亲伦理始被纳入“孝”字的涵义中。故《说文》“善事父母者”为孝，固然为后世所起之义，但其“子承父”则是原始继承、祭祀意义，此“承”字宜理解为继承、延续之义，也就是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强调的核心所在。

同样，我们对《论语·为政》篇中的“养”字，也可以有进一步的体会：“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养”字实际上正残存着孝亲的本初意义。由于孝字意义的扩大、延伸，“养”字的孝亲意义已经逐渐隶属于孝字，其本身则蜕变至一般的饮食层面的喂养，这对孔子来说自然是不够满意的。所以着重拈出一“敬”字，以防止人们将孝亲仅按照当时“养”字的一般意义去

<sup>①</sup> 查昌国：《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sup>②</sup> 查昌国：《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sup>③</sup> 陈爱平：《孝说》，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理解、实践。此表明“养”字的孝亲意义其时已消失殆尽，“孝”字已经开始全面接收了“养”字原先的孝亲意义。故在孔子的孝道伦理中，孝已绝然不只是西周时期的祭祀等义了，所谓孝子亦不再是拥有祭祀权的嫡长子，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家庭亲子间的关系上。正是在此意义上，查昌国先生说“孔子将孝下移至庶人，为人子者都是孝的主体”<sup>①</sup>，确是如此。

所以，对于远在西周之前的舜帝孝道（甚至整个五帝时代的孝道萌芽），康学伟先生说“此时的孝观念还远远不同于后世作为德目之一的孝道”，“这时的孝观念只是一种敬亲爱亲的感情，并未超出自然之性”<sup>②</sup>，还是很有道理的。否则，设若我们仅依据目前所见于卜辞、金文中的“孝”字及其涵义而断定孝起源于西周的话，未免对于此前由“畜”、“养”所代表的而非孝字统摄的孝亲伦理有避而不谈的嫌疑。

论者或曰：舜帝孝道所见载体亦即文献论证，仍然是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礼记》《孟子》《荀子》等，而且这些文献的内容仍不是事实陈述，而是理论推演、猜测，是对三皇五帝孝行的传说与赞扬。众所周知，三皇五帝时代是我国历史的神话传说时代而非信史时代，因而仅以儒家之经典文献，是难以保证这不是后人的传说或附会，其真实性是难以证明的。又曰：大舜是传说中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根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天问》）推测，应该在实行普那鲁亚婚制的野蛮时代。其时，人类父子关系尚不能明确，何来子孝其父？<sup>③</sup>

笔者认为这样反驳舜帝孝道，恐怕难以成立。首先，舜帝孝道所见载体亦即现存文献，如《尚书》等，为先秦最早之典籍，初并未为儒家所专有，及其成为儒家之经典文献，乃是孔子之后之事，未可以其后来成为儒家之经典文献，而据此认为舜帝孝道等出于儒者之附会。与其说舜帝孝道本无，出于儒者之附会，不如说舜帝孝道本有，以其符合儒家之理想（“修齐治平”）而为儒者所称颂。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大舜孝感天地平天下”时

<sup>①</sup> 查昌国：《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sup>②</sup> 康学伟：《论孝观念形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sup>③</sup> 参见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肖著167页又曰：“早在三皇五帝的所谓传说时代，舜帝就是一个孝子的典范，正因如此，他才被尧帝授予统治中国的王位。”斯又自相矛盾矣。



说：“由于这个历史故事所记载的反映，处于有大问题的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之间，不但没有反面坏的结果，反而存有正面的‘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好榜样。所以孔子极力尊崇尧、舜，并非只为尧、舜开创文化的德政而已。”<sup>①</sup> 诚为一语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固然难说是信史时代，但实际上通过“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还是可以考索出一定的史实来。退一步说，纵然舜帝孝道难如儒家所论的至圣至善，但它必然反映了舜帝确实以孝著称这一事实，否则我们可以问，为何不将此孝道附会至尧、禹乃至成汤身上，而独以舜为至孝呢？司马迁《史记》堪称信史，这已为近现代以来多次考古所证明，其《五帝本纪》依据《尚书》等史料，完整地呈现出舜帝孝道的风貌，我们透过其前后多处的记载，确实不难发现舜帝孝道的一致性和显著性。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太史公笔下的舜帝也还有先前帝王的那种“神话”色彩，但明显是削弱了许多，而更接近于现实中的人了。以太史公之卓见裁识，似亦未可说舜帝孝道实为子虚乌有。所以说，五帝时期以舜为代表的孝道，还是有着极大的可信性。其次，说“这些文献的内容仍不是事实陈述，而是理论推演、猜测”，亦不完全，《尚书》的《尧典》《大禹谟》篇中，“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与“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究竟是陈述大于推演、猜测，而“根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天问》）推测”，反而真是“推测”了，况且依据《天问》这样的楚辞文学材料，恐怕其可靠性还远不及儒家经典与诸子所论。

要之，正如康学伟先生所说：“疑古派的学者们不肯相信这些传说，但却提不出什么过得硬的否定证据。在地下史料尚极为缺乏且不成系统的今天，我们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当然理应以文献为主。”<sup>②</sup> 就目前来说，完全否定舜帝孝道诚不如姑且信之。换个角度想想，实则舜帝孝道之真假亦无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关键在于，数千年来舜帝孝道的符号化教化意义乃是真真切切已然发生过的，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周甲辰先生指出：“舜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性格心理，对中国的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

<sup>①</sup>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sup>②</sup> 康学伟：《论孝观念形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响。当然，这里的舜，已不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在经过无数思想家、理论家净化，美化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他早已经蜕化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圣王先帝。舜的事迹究竟有几分史实，几分虚构，哪是史实，哪是虚构，几千年前人们就有些模糊不清了。今天，我们要想彻底弄清楚，确实非常困难。”<sup>①</sup> 诚哉斯言！我们固然期待舜帝孝道研究的与时俱进、愈来愈清晰，但在此明确的结果出来之前，不妨仍虔诚地将其置于二十四孝之首，继续发挥其端正人心、敦勉孝道的教化作用，这对我们却也无害。

（刚谨按：此文发表于《孝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sup>①</sup> 周甲辰：《论舜帝之和》，《零陵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 《管子》中的孝道伦理

学术界对于《管子》的全方位研究，目前可谓如火如荼，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把握，复有分门别类式的微观挖掘，殊为可喜。倘若不是孤陋寡闻的话，我却发现，有关《管子》一书中孝道伦理的阐述与探讨，似乎尚无人问及。这是颇可奇怪的一个现象，学者们纵横捭阖于《管子》中的道德思想（包括治国、用人方面），难道书中屡屡强调的孝道伦理，在小至匹夫修身齐家，大到士大夫治国平天下之意义上，可以忽微不计吗？恐非如此。本文亦仅就此粗为缕述耳，抛砖引玉之意尤为殷勤，尚冀博雅君子有以教正焉。

## 一、忠与孝：忠孝伦理之对应性责任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言及中国传统之忠与孝，恒以专制独裁、愚昧奴性否定之、挞伐之，若钱穆、贺麟先生等，固已于此有所辨证矣。他则无论，专就《管子》书中阐述之忠孝伦理，其所申明之道德伦理对应性责任固昭昭在焉。所谓对应性责任，非谓伦理主体一方片面恪守其义务而全面服从另一方，乃是彼此双方各有其相应之责任，既包括义务，亦内含权利，其义务之履行，为其权利主张之必须条件，其权利之主张，则为其义务履行之当然结果。在《管子》中，这种对应性责任之强调，充分地体现于有相互关联性的忠道（君臣关系）和孝道（父子关系）两方面，且二者往往合而为一，不可分割。

《管子·形势》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